

国家认同的 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

——基于 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

李春玲 刘森林

摘要：我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较强，但不同社会人群和代际群体，其国家认同感强弱程度有所差异。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国家认同感；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存在代际差异。调研数据显示，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弱于老一代人；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更易于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而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更易于受到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正在形成过程中，爱国主义教育和舆论宣传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但是，靠单纯的宣传教育还不够，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让他们像老一代人一样，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培养和强化青年人的国家认同。

关键词：国家认同 代际差异 全球化 社会结构

作者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刘森林，福州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福州 350116）。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日益凸显，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与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息息相关。^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 国家认同感是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据研究，^③ 当今中国民众普遍具有较高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感，无论是青年一代还是老一辈群体，都表现出了对祖国领土和国家利益的归

①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01版。

③ 参见甄言：《国家认同的政治启示》，《北京日报》2008年7月28日，第17版；吕芳：《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调查与分析》，《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4期；徐平、张阳阳：《五个自治区国家认同的调查与研究》，《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属感和责任感，以及作为中国人的国家自豪感，但不同社会人群的国家认同感的强弱程度呈现出一些差异。深入研究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不同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差异，找寻提升民众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的途径，对于当前社会政治稳定和我国未来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认同是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主题，不同学科、不同理论流派对于认同概念的具体定义有所差异。一般认为，认同是个人或者群体的自我建构，^①它涉及我是谁或我们是谁、我在哪里或我们在哪里的反思性理解，^②以及什么对我和我们最有意义。^③社会学的认同理论特别强调社会及社会结构对自我认同的影响，认为认同的实质就是对社会建构的角色认同。^④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集体认同，是对自己与国家之间联系的意识，是公民个体主观认可的、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⑤主要是指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结构、精神价值等的主观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忧患意识和国家自豪感等主观感受。^⑥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认同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论题就出现于国际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并产生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而我国对于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在近十年才引起广泛关注，尤其自 2009 年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长，对国家认同概念的讨论逐步深入。^⑦我国学者的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讨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二是青年人的国家政治认同问题。虽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但缺乏对更广泛的国家认同概念的理解和研究视角，特别是缺乏对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另外，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从理论层面或历史分析视角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探讨，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采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分析较为少见，从而无法准确把握国家认同的总体状况。

为较全面地了解我国民众的国家认同状况，本文基于 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深入分析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民众国家认同感的影响，评估不同身份

① 参见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

② 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2008 年第 4 期。

③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7 页。

④ Sheldon Stryker and Richard T. Serpe, "Commitment, Identity Salience, and Role Behavior: Theory and Research Example," in W. Ickes and E. S. Knowles, eds., *Personality, Roles, and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Springer, 1982.

⑤ Leonie Huddy and Nadia Khatib,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1, 2007, pp. 63-77.

⑥ 柏贵喜：《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浅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1 期。

⑦ 陈茂荣：《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综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李崇富等：《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9 期。

群体的国家认同情感的强弱程度，重点比较青年一代和老一辈人的差异，探寻针对不同人群的增强国家认同感的途径。

一、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研究假设

国家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①这一建构过程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状况影响了国家认同的形成。^②国家认同可以被强化，也可能被弱化。^③在国家认同强化或者弱化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重点考察个人的经济条件、社会结构位置，以及文化因素对国家认同感的强弱程度的影响。

（一）经济因素与国家认同

一些学者指出，经济状况会影响人们的国家认同意识，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理论观点。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④英格尔哈特提出“匮乏假设”命题，认为处在经济和物质安全相对匮乏状态的人们，追求的是经济增长和物质安全，秉持的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国家寄予较高的希望，国家认同感比较强烈；而处在生活富裕和福利保障水平较高的环境中的人们，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们对经济和人身安全习以为常，较不可能视邻国民众为本族的威胁，这会导致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有所降低。英格尔哈特基于43个国家的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低收入国家的民众比富裕国家的民众具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而经济状况不稳定的人群比享有较好福利保障的人群具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感。^⑤哈特金恩和奥普芬格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收入水

① 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p. 133;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② János László, *Historical Tal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19-47; Daniel Bar-Tal and Ervin Staub, *Patriotism in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1997, pp. 171-172.

③ 郑晓云:《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④ 参见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页;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⑤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第17、348—352页。

平与国家认同感强度的负相关性。^① 乌尔里希·贝克表达了与英格尔哈特类似的想法，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完善为个体力量的强化奠定了基础，削弱了人们对集体性范畴的依赖，消解了基于“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和制度所依赖和参照的集体意识的形式”，^② 从而弱化了国家认同这类集体意识。

不论是英格尔哈特还是贝克的理论观点都具有这样的含义：当人们越来越富裕，生活越来越有保障时，人们对国家的依赖性会减弱，个人自主需求会增强，因而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就会弱化。虽然一些国外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说法，但在中国是否成立还需进一步的检验。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1：个人收入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

假设 1. 2：个人的就业稳定性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

（二）社会结构因素与国家认同感

英国“脱欧”公投的“社会分裂”和美国总统选举的“社会撕裂”，显示出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在国家认同意识方面有不同的观念，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会影响其国家认同感。许多国外的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社会成员，社会、经济、文化精英们的国家认同感较弱而全球化认同感较强。^③ 胡格荷和马克斯认为，由于全球化给精英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们从中受益较多，因而更认同全球化意识而弱化国家认同。^④ 相反，劳工阶层和中下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较少，还有可能面临外来移民竞争的冲击而利益受损。英格尔哈特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劳工阶层的国家认同感和排外情绪较强，而中产阶层和上层的国家认同感和排外情绪较弱。^⑤ 亨廷顿认为，“个人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程度，几乎是直接根据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定，精英人士参与得比一般人更深。”^⑥ 亨廷顿指出，“美国的商界、学术界、各种专业界和政界以及传媒和非盈利组织的精英人士广泛参与国际活动，其

① Kenneth Harttgen and Matthias Opfinger,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ligious D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ocial Sciences*, vol. 67, no. 3, 2014, pp. 346-367.

②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③ 参见 Neil Fligstein, *Euroclash: The EU, European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tthew J. Gabel, *Interests and Integration: Market Liberalization, Public Opinion, and European Un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④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no. 1, 2009, pp. 1-23.

⑤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第 380 页。

⑥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第 194 页。

国民身份的重要性降低,因而日益将自己视为跨国人士,从跨国和全球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利益和事业。”^①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精英人士轻国民身份而重全球身份和跨国身份,与美国公众仍然高度重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导致美国“民族精神黯然失色”、“爱国主义衰退”、“民族特性受围攻的困境”和“美国公民身份的贬值”。^②于海涛等在讨论全球化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时也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使部分社会群体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机会,而另一些群体则可能感受到利益受到冲击。因此,全球化可能会增强某些群体的国家认同感,而弱化另一些群体的国家认同感。^③

毫无疑问,做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家们和出国旅游的中间阶层,的确是当今全球化的宠儿。中国企业家走向世界的步伐是与“中国崛起”同步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为中国企业家的海外扩张创造了机会。中国的文化精英们的国际化道路也是如此,“中国崛起”不仅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出国交流机会,也使他们的观点看法在国际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出国旅游的中间阶层可能感受最深:国家地位的提高,使他们在海外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尊重。可以这么说,当代中国精英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伴随着“中国崛起”,是“中国崛起”造就了他们。那么,这样的成长历程,会使他们在增长了全球化意识的同时而弱化其国家认同吗?此外,中国较低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不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层明显感受到全球化对他们利益的冲击,外来移民与他们竞争就业机会;企业家把工厂搬到海外,让他们失去就业机会。中国的工人没有这样的体验,至少至今还没有。过去20年伴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都在增长,他们不太可能产生像欧美工人阶层那样强烈的排外情绪和反全球化意识。

中国各社会群体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和感受,使当前中国社会不太可能出现英国和美国正在经历的精英、中产与劳工阶层的社会分裂,不过,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群因卷入全球化程度不同而产生国家认同差异的现象还是有所表现。为考察亨廷顿等人提出的全球化导致精英人群或中产人群国家认同感弱化是否在中国社会出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1: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

在中国社会,除社会阶层位置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结构因素,也有可能影响人们的国家认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是有一些制度安排影响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比如:户口身份反映了人们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就业单位类型是指人们是否在公有部门就业;党员身份代表了人们的政治地位或政治资源。国家

①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88页。

②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02页。

③ 于海涛、张雁军、乔亲才:《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认同内容及其对群际行为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5期。

认同不仅包含对地域概念、历史文化概念和民族归属的国家(nation)的认同,同时也包含与政治体制及政治理念相关的国家(state)的认同。^①与国家联系更为紧密的群体,比如就业于政府部门或具有党员身份的人,可能国家认同感更强。另外,在中国社会,户口制度是导致人们社会经济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因素。不同户口身份的人,社会经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有所差异,其对全球化的感知也有所不同,这些有可能影响人们的国家认同。比如,农业户口的人可能比城镇户口的人更多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国家认同感更强;而城镇户口的人接触更多的外来文化,国家认同感可能较弱。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2: 相对于在非公有部门的就业者,在公有部门的就业者的国家认同感更强;

假设 2.3: 相对于非党员身份的人,党员的国家认同感更强;

假设 2.4: 相对于城镇户口的人,农业户口的人国家认同感更强。

(三) 文化因素与国家认同感

文化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外来文化会对本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产生冲击。亨廷顿认为,导致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损害了美国民众的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即“美国信念”。^②在亨廷顿看来,“国民身份认同日趋淡化”的局面正是由于异质文化相互间交流所引起的,这有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国民身份认同的危机。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中也都出现了:“这一危机同时出现在美国和如此之多的其它国家和地区,这也表明很可能有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③在欧洲,超国家的欧洲认同与国家认同产生冲突。“相比而言,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面对的国家认同挑战更为复杂多元,如何既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又彰显本国特性是这些国家面临的巨大难题,它们深刻地意识到,国家认同不仅影响着其内政走向,也影响着其国际角色和国际地位。”^④亨廷顿把这类

①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陈茂荣:《马克思主义视野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柏贵喜:《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浅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

②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4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1页。

④ 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现象称为“文明的冲突”。^① 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亨廷顿的看法，认为全球化认同未必一定导致国家认同的弱化，比如，欧洲认同与各自国家的认同可以多元共存。^②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通过考察文化水平和接受信息渠道与国家认同间的关系，来验证文化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③ 一般来说，文化水平越高，接受信息渠道越多元化，越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而导致其国家认同感的弱化。许多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受教育水平与国家认同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国家认同程度越低，受教育较多的人的国家自豪感较弱。^④ 哈德勒、赛斯苏和齐恩等人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的34个欧洲国家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国家认同感较弱。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1：受教育程度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

媒介和信息对人们的国家认同感的强化或弱化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具有影响人们价值观的潜力，95%的实证研究显示，传媒接触导致观念的变化，而互联网等电子媒介则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范围传播信息和影响人们的观念。^⑤ 不同的媒介传播不同的信息，对人们的国家认同感的影响也不同。^⑥ 曼纽尔·卡斯特和本尼迪克·安德森等都强调了信息化社

-
- ①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 ② 于文杰、成伯清主编：《欧洲社会的整合与欧洲认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172—175页。
- ③ Markus Hadler, Kiyoteru Tsutsui and Lynn G. Chin, “Conflicting and Reinforcing Identities in Expanding Europe: Individual- and Country-Level Factors Shaping National and European Identities, 1995-2003,”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7, no. 2, 2012, pp. 392-418; Jonathan Cohen, “What I Watch and Who I Am: National Pride and the Viewing of Local and Foreign Television in Israe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8, no. 1, 2008, pp. 149-167.
- ④ Jerome S. Legge Jr., “Antiforeign Sentiment in Germany: Power Theory versus Symbolic Explanation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8, no. 2, 1996, pp. 516-527; Robert M. Kunovich,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no. 4, 2009, pp. 573-593.
- ⑤ 参见 Sandra J. Ball-Rokeach, Milton Rokeach and Joel W. Grube, *The Great American Values Test: Influencing Behavior and Beliefs Through Television New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⑥ 王冠：《国家主义还是共同体主义：应对网络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变化研究》，《人文杂志》2014年第10期；陆晔：《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理论关系的经验检视》，《新闻大学》2010年第2期。

会和媒体全球化趋势对人们的国家认同的影响。^① 以往传统媒体主要由国家所控制，国家通过媒体强化人们的国家认同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和全球化的推进，使大众媒体出现了“国际化、私有化和碎片化”趋势，这有可能弱化国家认同。^②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理论则进一步指出，传播外来文化元素的国际化媒体为美国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念所主导，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国家认同产生不利影响。^③ 在中国社会，传统媒介（主要指报纸、杂志等）更多地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官方所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接触较多传统媒介可能强化国家认同；新媒介信息（主要指互联网）则包括更加多元化和更多的国外文化信息，接触较多新媒介可能会弱化国家认同。^④ 不过，要检验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需要追踪调查数据，对国家认同感进行重复测量，以检验传统媒介和新媒介接触频率增加或减少是否会导致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本文所采用的是一个时间点的调查数据，只能检测传统媒介和新媒介接触频率与国家认同感是否存在相关性，虽然两者存在的相关性不足以证明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影响作用，但其对进一步考察媒介接触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思路。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2：传统媒介（指报纸杂志）使用频率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强；

假设 3.3：新媒介（指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

（四）代际差异与国家认同

社会变迁带来了价值观变化，而这种变化常常表现为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⑤

- ①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30、418—425页；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 ② S. B. Crofts Wiley, “Rethinking National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14, no. 1, 2004, pp. 78-96; M. Schudson, “Cultu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46, no. 139, 1994, pp. 63-81; T. Ashuri, “The Nation Remembers: National Identity and Shared Memory in Television Documentar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1, no. 3, 2005, pp. 423-442.
- ③ R. W. McChesney, “Global Media, Neoliberalism, and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52, no. 10, 2001, pp. 1-19; H. I. Schiller,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 ④ 本文数据只提供了“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使用频率信息，没有更进一步的媒体种类信息，因此文章只检验了“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使用频率与国家认同间的关系。
- ⑤ 参见李春玲：《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

在社会变迁的环境下，人们因为不同年龄或者身处不同世代，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认同感和政治态度。^① 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异，部分是由于不同年龄的生理或者心理上的区别造成的，^② 但更重要的是由社会变迁导致不同代际的不同历史经历，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改变所致。^③

国家认同感作为价值观的一个核心部分，也会因社会变迁而出现代际差异。关于国家认同感的代际差异，英格尔哈特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中给予了解释。英格尔哈特提出“社会化假设”，提出未成年阶段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奠定了人一生的价值取向，而每一代人由于青少年时期不同的生活境遇形成了价值观念的代际差异，代际更替推动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④ 老一代人的青少年时期往往是在物质较为匮乏的环境中度过，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国家认同意识）成型于青少年时期，尽管之后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观念将保持稳定而变化不大。当代青年人生活在物质生活条件较好、生存环境更有保障的时代，他们更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国家认同感弱于父辈一代。史密斯和金的一项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在绝大多数国家，年龄越大的人爱国主义倾向越强烈。^⑤ 唐文方和本杰明·达尔在2008年对3000多位中国人的调查发现，年长的中国人比年轻人更具有民族意识，国家认同感更强。^⑥

同时，全球化对青年人的影响也要大于老一辈。青年人所接受的教育和信息包含更多的多元文化内容，青年人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受全球化的影响更大，国家认同危机也更强烈，这也是大学生国家认同问题受到较多关注的原因。^⑦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 ① 布伦盖特夫妇：《生命过程与代政治学》，孙忠雄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12期；周晓虹：《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社会》2008年第2期。
- ② 参见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
- ③ Emma Parry and Peter Urwi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vol. 13, no. 1, 2011, pp. 79-96.
- ④ 参见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第3页。
- ⑤ Tom W. Smith and Seokho Kim, “National Prid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95/96 and 2003/0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18, no. 1, 2006, pp. 127-136.
- ⑥ 转引自邵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从何而来？影响几何？》，《青年参考》2012年9月12日，第02版。
- ⑦ 刘森林：《当代中国青年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吕芳：《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调查与分析》，《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4期。

假设 4.1: 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弱于老一代;

假设 4.2: 高等教育与国家认同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代际差异不只体现在国家认同感的强弱程度上,还表现在相关影响因素方面。青年人的职业生涯刚开始,青年群体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还没有拉开较大的距离,因此社会结构因素对他们的国家认同感的影响较弱;文化因素对青年人国家认同感的影响较大,因为青年人正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教育和传媒信息会对他们的认同感产生直接影响。老一代人的价值观已基本定型,传媒信息对他们的国家认同感的影响较弱,但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较为明显。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3: 社会结构因素对老一代人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大于青年一代;

假设 4.4: 文化因素对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大于老一代人。

二、数据、概念界定与变量

(一) 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 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CSS 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详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2013 年的 CSS 调查覆盖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596 个县(县级市、区、旗),共回收成功访问问卷 10206 份。调查采用了多阶段复合抽样 (multi-stage composed sampling) 的方法,调查对象为 18—70 岁的中国公民。调查内容涉及被访人的家庭、职业、收入、消费、态度等多方面信息,其中也包括国家认同感。根据因变量“国家认同感”一题的答题情况,本文最后确定有效样本数为 10185 个。

(二) 国家认同感概念界定及测量

国家认同是一种对自己与国家之间联系的意识,是公民个体主观认可的、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①主要是指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结构、精神价值等的主观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忧患意识和国家自豪感等主观感受。^②对于国家认同感的具体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国家认同感就是公民认同感。^③安德烈亚斯·珀尔曼认为,国家认同应该从四个维度去理解,即公民国家身份、民

① Leonie Huddy and Nadia Khatib,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1, 2007, pp. 63-77.

② 柏贵喜:《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浅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1 期。

③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族国家身份、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自豪感。^① 亨廷顿认为，国家认同有四个组成部分：民族属性、人种属性、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其中文化因素是最核心的内容。^② 崔贵强把国家认同视为“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了感情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个人（自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在自我内部，国家也被内摄，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个人与国家已经浑然结合为一体，个人以国家的利益为个人的利益，因此表现在个人的行为上，就是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③ 佐斌认为，国家认同感（或民族认同感、国家身份感）是人们对自我的国家成员身份（national identity）的知悉和接受。^④ 陈茂荣认为，除身份感（归属感）外，国家认同感还应涵括责任感、义务感和荣誉感。^⑤ 概括上述各种概念界定，本文把国家认同感的核心内容确定为个人对国家的身份认同（归属感）、国家荣誉感和责任感（带有“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含义）。

本文对“国家认同感”的测量方法借鉴了政治学家普遍采用的公众态度调查测量方法，即根据问卷调查被访者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所构建的态度测量量表，给每一种答案赋以确定的分值，根据得分的高低判断其国家认同感的强弱。具体测量包括一组5道题的提问，这5道题包含个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和国家荣誉感及责任感等内容（参见表1）。

表1 国家认同感测量

| 提问 | 测试题 | 答案选项赋值 |
|---------------------|---|--|
| 下列描述在多大程度上和您实际情况相符？ | A. 当别人批评中国人的时候，我觉得像是在批评我自己。 B. 我经常因国家现存的一些问题而感到丢脸。 C. 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D.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 E. 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即使有机会离开，我也会留在中国。 | 很不符合（-2分） 不太符合（-1分） 不好说（0分） 比较符合（1分） 很符合（2分） |

本文的“国家认同感”强弱程度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的计分方法。表1的5道测试题分别有5个选项答案：“很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很符合”和“不好说”，各选项答案分别赋值为-2、-1、0、1和2分，5道题得分加总，产生一个复合变量“国家认同感”；“国家认同感”得分越高，表示国家认同感越强。为确保复合变量“国家认同感”的有效性，本文通过Cronbach's Alpha检测上述5

① Andreas Pöllmann, “National Attachment among Berlin and London Head Teachers: The Explanatory Impact of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Pride and Supranational Attachment,”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8, pp. 45-53.

②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第43页。

③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若干观察（1945—1959年）》，《南洋问题研究》1989年第2期。

④ 佐斌：《论儿童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教育研究与实验》2000年第2期。

⑤ 陈茂荣：《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综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道测试题是否可以建构一个测量指数。Cronbach's Alpha 是测量一组提问内在异质性的系数,由此可以判断这一组提问是否代表了同一种态度倾向,以及是否可以构成一个态度测量指数。一般而言,Cronbach's Alpha 系数高于 0.6,表明这一量表的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内。本研究所建构的“国家认同感”变量,其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24,信度较高,表明这 5 道题目可以构成一个国家认同感强度指数。

(三) 自变量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考察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国家认同感”是因变量,自变量(影响因素)主要分为 4 大类: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文化因素和代际因素。

1.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由 2 个变量来测量: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就业稳定性。收入是通常采用的代表经济能力的指标,工作稳定性反映个人经济安全性或经济风险程度。2013 年 CSS 数据提供了被访者家庭的年总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的信息,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家庭年总收入除以家庭成员人数所得值。对家庭人均年收入进行分组:低收入组(10000 元以下)、中低收入组(10000—30000 元)、中高收入组(30000—70000 元)和高收入组(70000 元以上)。工作稳定性是指在未来 6 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选择“不太可能失业”和“完全不可能失业”表明工作稳定;选择“完全有可能失业”、“有可能失业”和“不确定”则归为工作不稳定。

2. 社会结构因素

社会结构因素包括 4 个指标:社会阶层地位(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单位类型、户口身份和政治身份。社会阶层地位归为三大类:基础阶层(包括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中间位置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优势地位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单位类型分两个类别:一是公有部门(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集体事业单位、集体企业,协会、行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自治组织);二是非公有部门(排除公有部门所包含的类别)。^① 户口身份分两类: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政治身份分两类:党员和非党员。

3. 文化因素

^① 吴愈晓、王鹏、黄超在《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社会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中,将党政机关、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或集体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居/村委会归为公有部门;梁玉成在《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在初职进入和代内流动上的不同模式》(《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中,将“集体企业”也归为公有部门。本文认同并采用上述归类。

文化因素包括3个变量：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使用传统媒介（指阅读报纸杂志）的频率和使用新媒介（例如，使用互联网浏览新闻）的频率。使用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频率分别设定为两类：a. “频率低”（包括从不、一年几次、一月至少一次、一周至少一次）；b. 频率高（包括一周多次、几乎每天）。

4. 代际因素

代际因素分别考虑了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连续变量为年龄，分类变量区分了青年群体与老一代群体。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社会化假设”，价值观的代际差异是由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所导致，青年一代的生活环境与老一代人的生活环境间有根本的区别，从而形成了青年人与老一代人的不同的价值态度。改革开放导致我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以改革开放为社会背景，出生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群。^①因此，本文把改革开放作为代际分界线，青年群体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人，在2013年调查时的年龄为18—35岁；老一代群体是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的人，在2013年调查时的年龄为36岁及以上。

5. 控制变量

本研究把性别和地区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四）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2列出了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基本情况。

表2 变量情况描述

| 变量 | 性质 | 均值 | 标准差 | 说明 |
|-------------|----|---------|----------|--------------------------|
| 因变量 | | | | |
| 国家认同 | 连续 | 5.27 | 3.14 | 最小值-10，最大值10，分值越高，认同感越强 |
| 自变量 | | | | |
| 家庭人均年收入 | 连续 | 14588.1 | 18775.12 | 最小值0，最大值433333.3 |
| 就业稳定性 | 定类 | 0.84 | 0.46 | 稳定=1，不稳定=0 |
| 客观阶级地位 | 定类 | 1.18 | 0.44 | 基础阶层=1，中间位置阶层=2，优势地位阶层=3 |
| 单位类型 | 定类 | 0.88 | 0.32 | 体制内=0，非体制内=1 |
| 户口身份 | 定类 | 0.32 | 0.47 | 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1 |
| 政治身份 | 定类 | 0.10 | 0.30 | 非党员=0，党员=1 |
| 是否受过高等教育 | 定类 | 0.13 | 0.34 | 否=0，是=1 |
| 使用传统媒介频率 | 定类 | 0.18 | 0.38 | 频率低=0，频率高=1 |
| 使用新媒介频率 | 定类 | 0.75 | 0.43 | 频率低=0，频率高=1 |
| 其他变量 | | | | |
| 性别 | 定类 | 0.45 | 0.50 | 女=0，男=1 |
| 年龄 | 连续 | 45.72 | 13.64 | 最小值18，最大值72 |
| 代际 | 定类 | 0.25 | 0.43 | 35岁以上=0，18—35岁=1 |

^① 李春玲、施芸卿：《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8—444页。

表 2 列出的国家认同感的平均得分为 5.27, 远高于分值设定 (-10 至 10 分之间) 的中间值 (0 分), 这表明, 总体而言, 我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较强。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 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表 3 所列的 4 个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年龄因素对个人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模型 1 纳入研究假设涉及的所有自变量。在经济因素方面, 收入水平对国家认同感有显著影响, 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 收入水平越高, 国家认同感越弱, 这与英格尔哈特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但代表经济安全感的变量 (工作稳定性)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假设 1.1 得到支持, 但假设 1.2 没有得到证实。

社会结构变量中仅有客观阶层地位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但不无意外的是, 与基础阶层和中间位置阶层相比, 优势地位阶层的国家认同感更强, 而中间位置阶层与基础阶层的国家认同感没有显著差异, 这与亨廷顿、英格尔哈特等人的观点相左。亨廷顿和英格尔哈特认为, 精英和中间阶层的国家认同感要弱于中下阶层和劳工阶层。本文的数据结果则发现, 中国的精英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国家认同感并不弱于工农阶层, 相反, 精英阶层还表现出比其他阶层更强的国家认同感。数据结果还显示, 户口身份也对国家认同有影响, 非农户口的国家认同感弱于农业户口者。另外两个社会结构因素 (单位类型和党员身份) 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都不显著。假设 2.1 被拒绝, 假设 2.2 和假设 2.3 也没有得到证实, 但假设 2.4 得到支持。

文化因素中, 高等教育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十分显著, 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国家认同感明显弱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 这一结果与其他实证研究结论一致。传播媒介和新媒介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 没有证实媒介使用与国家认同感之间的相关性。假设 3.1 获得支持, 但假设 3.2 和假设 3.3 没有得到证实。

年龄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十分显著, 年纪较长的人, 国家认同感更强, 这与英格尔哈特的观点以及大多数实证研究结果一致。性别的影响则不显著。

模型 2 用收入分组变量代替了收入连续变量, 结果发现, 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的国家认同感与低收入组没有差异, 只有高收入组的国家认同感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组。这说明, 收入对国家认同感的弱化作用主要体现在高收入者群体中。

表 3 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及各组变量的解释贡献率

| 自变量 | 模型 1 (总体) | 模型 2 (总体) | 模型 3 (18—35 岁) | | 模型 4 (36 岁及以上) | |
|-----------|--------------|--------------|----------------|-------|----------------|-------|
| | 回归系数 | 回归系数 | 回归系数 | 解释贡献率 | 系数 | 解释贡献率 |
| 人口特征 | | | | 16.64 | | 17.13 |
| 男性 | -0.015 | 0.005 | 0.181 | | -0.187 | |
| 年龄 | 0.045*** | 0.044*** | 0.060** | | 0.044** | |
| 经济因素 | | | | 29.49 | | 11.53 |
| 家庭人均年收入 | -0.000*** | — | -0.000*** | | -0.000* | |
| 中低收入 | — | 0.159 | — | | — | |
| 中高收入 | — | 0.135 | — | | — | |
| 高收入 | — | -1.374** | — | | — | |
| 工作稳定性 | -0.200 | -0.239 | -0.201 | | -0.127 | |
| 社会结构因素 | | | | 14.95 | | 49.52 |
| 中间阶层 | 0.302 | 0.283 | 0.055 | | 0.601** | |
| 优势阶层 | 0.925** | 0.874* | 0.074 | | 1.302*** | |
| 非体制内 | -0.339 | -0.342 | -0.572* | | -0.100 | |
| 非农户口 | -0.435* | -0.497* | -0.348 | | -0.474* | |
| 党员 | 0.408 | 0.419 | 0.090 | | 0.624** | |
| 文化因素 | | | | 36.21 | | 13.34 |
| 接受高等教育 | -0.654** | -0.694** | -0.785** | | -0.518 | |
| 传统媒介使用频率高 | 0.018 | 0.024 | 0.516** | | -0.454 | |
| 新媒介使用频率高 | 0.241 | 0.219 | 0.418 | | 0.137 | |
| 地区 | | | | 2.71 | | 8.48 |
| 中部地区 | 0.199 | 0.212 | 0.115 | | 0.249 | |
| 西部地区 | -0.010 | 0.012 | 0.226 | | -0.321 | |
| 常数项 | 18.914*** | 18.716*** | 18.536 | | 18.882 | |
| R-sqr | 0.044 | 0.045 | 0.039 | | 0.044 | |
| Prob>F | 0.000 | 0.000 | 0.000 | | 0.000 | |
| N | 10185 | 10185 | 2511 | | 7674 | |

注：*p<0.05, **p<0.01, ***p<0.001。

(二) 国家认同感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模型 3 和模型 4 比较了青年一代 (18—35 岁) 和老一代人 (36 岁及以上) 的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 Shapley 值分解方法, 对国家认同感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分析。Shapley 值分解方法可以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分解各自变量的具体贡献和相对重要程度,^① 同时, Shapley 值分解

① Guanghai Wan, “Accounting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2, no. 2, 2004, pp. 348-363; 陈斌开、杨依山、许伟:《中国城镇居民劳动收入差距演变及其原因: 1990—2005》,《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2 期。

的各变量的贡献率可以相加，从而可以估计出一组自变量的总贡献率。^①

Shapley 分解值显示，在青年一代的模型中，经济因素可以解释 29.49% 的国家认同感差异；社会结构因素可以解释 14.95% 的国家认同感差异；文化因素可以解释 36.21% 的国家认同感差异；其他 19.35% 的差异由年龄、性别和地区等因素解释。在老一代人的模型中，经济因素解释力明显小于青年一代（11.53%）；社会结构因素解释力则远远大于青年一代（49.52%）；而文化因素解释力又小于青年一代（13.34%）。这些说明，对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影响最大的是社会结构因素，它解释了老一代人国家认同感 50% 的差异，而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对青年一代国家认同感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因素，其次是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作用最小。

在经济因素方面，工作稳定性对青年一代和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都没有影响；收入水平对青年人和老一代人都有影响，收入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但是，收入对两代人的影响程度不同，对青年人的影响更大也更明显（解释贡献率更大且系数更为显著），对老一代人的影响则微弱（解释贡献率小且系数微弱显著）。

在社会结构因素方面，社会阶层位置对老一代人有显著影响，阶层地位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强，处于优势阶层位置的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的强烈程度高于中间位置阶层，而中间位置阶层的国家认同感又高于基础阶层。同时，党员身份和户口身份影响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老一代人中的党员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而非农户口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弱于农业户口人群。不过，就业单位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对老一代人没有影响。

社会结构因素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不仅小于对老一代人的影响，而且影响机制也不同。对老一代人有强烈影响的社会阶层位置因素对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影响老一代人的户口身份对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也没有影响。更令人吃惊的是，能增强老一代人国家认同感的党员身份没有增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不过，对老一代人没有影响的社会结构因素——单位类型，对青年一代有显著影响，在公有部门就业的青年的国家认同感高于在非公有部门就业的青年。

在文化因素方面，三个自变量对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都没有显著影响，但其中的两个因素（接受高等教育和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弱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同时，传统媒介使用频率高的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强于使用频率低的青年。

综合来看，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因素存在极为突出的代际差异，对于老一代人，客

① 参见万广华：《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等：方法和证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Jun Yan, Xiao Huang and Xin Liu, "An Analysis of Education Inequalit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7, no. 2, 2014, pp. 2-10.

观社会阶层位置是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国家认同感较强；党员身份也有助于增强国家认同感，但非农户口身份和高收入会弱化国家认同感；接受高水平教育不会显著弱化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传播媒介对老一代人的影响也不显著。青年一代的情况则极为不同，高收入和高水平教育会弱化其国家认同感，不过，多接触传统媒介有可能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本文提出的代际差异的两个假设（假设4.3和假设4.4）都得到了证实。假设4.2也得到支持，即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其国家认同感弱于较低文化水平的青年。另外，年龄因素对两个代际群体都有影响，不论是青年一代还是老一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国家认同感都会增强。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数据结果显示，虽然我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较强，但不同社会人群和代际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强弱程度有所差异；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国家认同感；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存在代际差异。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弱于老一代人，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弱化更为明显；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更易于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而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更易于受到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有的发现部分支持了英格尔哈特的理论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有的发现则表明，这些理论假设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作用方式与西方社会有所不同。亨廷顿等人提出的“精英国家认同感弱化”现象在当前中国没有出现，相反，中国社会的优势地位阶层的国家认同感比中间位置阶层和基础阶层的国家认同感更强。

本文的一些数据分析结果与英格尔哈特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弱化国家认同感。不过，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青年人身上，教育水平对老一代人没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对老一代人有较弱的影响。同时，这两个因素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发挥作用。例如，在收入方面，只有达到较高收入水平，弱化国家认同的现象才会出现；在教育方面，接受高等教育会弱化国家认同感。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青年人国家认同感的弱化作用与全球化有必然联系。不过，数据显示，较多接受传统媒介信息的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更强。这表明，舆论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可能在提升国家认同感方面发挥作用。数据还显示，互联网等新媒介的使用频率与青年的国家认同感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虽然新媒体传播的信息更加多元化，但青年人还是有可能进行理性的判断和选择。罗斯、里昂和齐瑞思苏库乌等人在研究国家认同感时区分了感性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与理性爱国主义（constructive patriotism）。感性爱国主义指对国家强烈的、一成不变的依恋和坚定不移的忠诚，不能容忍对国家的任何批评非议，对外来文化和事物具有较强的排外情绪；而理性爱国主义则以对国家的批判性忠诚为特征，在希望国家

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动机驱使下，关注国内、国外事物，提出批评建议，以开放的心态选择性地接受外来信息。^① 在全球化时代，单纯地向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灌注感性爱国主义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而培育青年人的理性爱国主义，才能使他们在多元文化冲击的环境下做出恰当的选择，稳固和增强国家认同感。另外，数据显示，党员身份有助于增强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但在青年群体中却没有这种效应。近十几年来，大量的大学生加入党员队伍，但入党筛选过程和入党后的思想教育并未在提升国家认同感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如何提升青年党员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情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的数据结果与多数国外研究最突出的不同表现在社会阶层地位与国家认同感之间的关系方面。国外多数实证研究表明，精英群体和中间阶层的国家认同感弱于中下阶层和劳工阶层，亨廷顿特别强调了精英人士重视全球认同而忽视国家认同。本文却发现，不仅中间位置阶层的国家认同感不弱于基础阶层，而且，优势地位阶层的国家认同感还强于中间位置阶层和基础阶层。在中国，国家和政府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精英群体及中间阶层的生成和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相关，精英群体及中间阶层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步伐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过程，导致精英群体及中间阶层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并没有明显弱化他们的国家认同。此外，中国的工人阶层也不像西方国家的工人阶层那样成为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相反，他们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机会。这说明，当前中国社会在国家认同方面不太可能出现像美国和英国那样的“社会撕裂”现象。而这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可能是国家在全球化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所导致的。在欧美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精英群体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其全球化策略（比如企业迁往海外和吸纳国外移民以获取廉价劳动力和降低生产成本）使精英群体极大地获益而劳工阶层受损。在中国，国家和政府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全球化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这一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球化最大获益者的精英群体往往与国家之间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因此，不会因为他们融入全球化而导致其国家认同感弱化。同时，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策略不仅使精英群体获益，而且也保障了基础阶层的利益。全球化策略的国别差异及其对不同阶层的国家认同感的影响还需做更深入的研究，亨廷顿的相关理论陈述把这一问题简单化了。

另外，收入因素与国家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也表现得比较特殊。数据显示，高收入会弱化国家认同，但主要表现在青年人身上，对老一代群体的影响则较弱。因此，所谓的“富人不爱国”并不准确。我们进行的一些个案访谈印证了数据分析

^① Despina M. Rothi, Evanthia Lyons and Xenia Chryssochoou, “National Attachment and Patriotism in a European Nation: A British Stud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6, no. 1, 2005, pp. 135-155; 于海涛、张雁军、乔亲才：《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认同内容及其对群际行为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5期。

的结果。中老年群体中的高收入者，包括那些在海外投资甚至移民海外的人，仍怀有较强的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和中国文化认同。而高收入的青年人有条件经常出国体验西方生活方式、接触西方文化并享有高品质的西方商品，这对中国文化和其国民身份的认同感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那些高学历并掌握市场稀缺专业技能而选择技术移民的青年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较低，但这些青年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在制定提升民众国家认同意识的战略对策时，还需注意到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老一代人强烈的爱国情怀不易于受到全球化文化和物质生活环境改变的影响，而青年一代则相对容易受到冲击，对于高收入和高文化水平的青年尤其如此。英格尔哈特的“社会化假设”效应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已经形成并保持稳定，即使他们基于个人利益需求和事业发展考虑选择移民或投资国外，在情感和认同方面仍倾向于祖国；舆论对他们不必过度指责，反而应强化他们对国家的依恋情感，鼓励他们为国家发展多作贡献。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正在形成过程中，爱国主义教育和舆论宣传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但是，对于最易受到全球化影响的高收入、高文化水平的青年，靠单纯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让他们像老一代的精英和中间阶层人群一样，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他们的全球化体验与国家认同感共生共存，这样才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概言之，创造发展机会是提升青年人国家认同感的长效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由于本研究采用的调查数据的局限性，无法对部分变量的影响作用做准确考察，比如，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接触频率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的追踪调查数据。此外，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而2013年至今中国社会已发生了许多变化，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特别是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可能发生了变化。同时，国家认同感的年代变化趋势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研究主题，这将是未来我们考虑深化研究的一个方向。概言之，关于国家认同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辑：冯小双〕

weakens the function of those reforms that take governance as their value goal.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a completely new logical structure involving a three-stage sequential power list has been proposed within the two-dimensional legality/optimality structure of modern administrative law. Firstly, legitimate criteria for power setting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improve th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achieve a relatively thorough review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existing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power, so that reform is genuinely reoriented toward the core objectives of “remodeling the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govern.” Secondly, we need to provide a benchmark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for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jurisdiction by subject area and level for government control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Lastly, we suggest as the optimum control tool an operational plan that will simultaneously take into account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rights protec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ublic law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7) Factors Affec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fferences in Intergen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for 2013

Li Chunling and Liu Senlin • 132 •

The Chinese have quite a strong national identity, but the strength of this sense of identity vari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different generations.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 all affect individual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re ar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people' 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it.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s a weaker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than the older generation. The older generation is more susceptible to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 whil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more susceptible to cultural and economic factors. Young people' s national identity i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ormed,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directed at public opinion can help to enhance it. However, simpl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re not enough; if we are to strengthen young people' 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we must create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m and have them link personal development closely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as old people do.

(8) Foreign Writings on Yan' an (1934-1949) *Zhao Xueyong and Wang Xin* • 151 •

In the 1930s and 1940s, writers from abroad foregathering in Yan' an drew back

• 207 •